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

总主编：章开沅 副总主编：周 勇



档案文献·乙

国民参政会纪实(续编)

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编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档案文献·乙

国民参政会纪实(续编)

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编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主 编：孟广涵

副 主 编：周永林 周 勇 刘景修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民参政会纪实:续编 / 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共重庆市委党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重庆:重庆出版社,2016.1

ISBN 978-7-229-10815-1

I. ①国… II. ①重… ②中… ③中… III. ①国民参政会—史料 IV. ①D693.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01763 号

国民参政会纪实(续编)

GUOMIN CANZHENG HUI JISHI(XUBIAN)

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编

责任编辑:林 郁

责任校对:何建云

装帧设计: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吴庆渝 陈 永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自贡兴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40mm×1030mm 1/16 印张:31 字数:458千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10815-1

定价:6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

编纂委员会

总 主 编：章开沅

副总主编：周 勇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山田辰雄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

马 振 犊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馆长、研究馆员

王 川 平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名誉馆长、研究员

王 建 朗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方 德 万 英国剑桥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巴 斯 蒂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教授

西村成雄 日本放送大学教授

朱 汉 国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任 竞 重庆图书馆馆长、研究馆员

任 贵 祥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中共党史研究》主编

齐 世 荣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刘 庭 华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汤 重 南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步 平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何 理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国防大学教授

麦 金 农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

- 玛玛耶娃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教授
- 陆大铨 重庆市档案馆原馆长、中国档案学会常务理事
- 李红岩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研究员、《历史研究》副主编
- 李忠杰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 李学通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近代史资料》主编
- 杨天石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 杨天宏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 杨奎松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 杨瑞广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 吴景平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 汪朝光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 张国祚 国家社科基金规划办公室原主任、教授
- 张宪文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 张海鹏 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 陈晋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 陈廷湘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 陈兴芜 重庆出版集团总编辑、编审
- 陈谦平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 陈鹏仁 台湾中正文教基金会董事长、中国文化大学教授
- 邵铭煌 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主任
- 罗小卫 重庆出版集团董事长、编审
- 周永林 重庆市政协原副秘书长、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名誉会长
- 金冲及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研究员
- 荣维木 《抗日战争研究》主编、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 徐勇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 徐秀丽 《近代史研究》主编、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 郭德宏 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 章百家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 彭南生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傅 高 义 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教授
温 贤 美 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
谢 本 书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简 笙 簧 台湾国史馆纂修
廖 心 文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熊 宗 仁 贵州省社科院研究员
潘 洵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魏 宏 运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编辑部成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朱高建 刘志平 吴 畏 别必亮 何 林 黄晓东 曾海龙 曾维伦

总 序

章开沅

我对四川、对重庆常怀感恩之心,那里是我的第二故乡。因为从1937年冬到1946年夏前后将近9年的时间里,我在重庆江津国立九中学习5年,在铜梁201师603团当兵一年半,其间曾在川江木船上打工,最远到过今天四川的泸州,而启程与陆上栖息地则是重庆的朝天门码头。

回想在那国破家亡之际,是当地老百姓满腔热情接纳了我们这批流离失所的小难民,他们把最尊贵的宗祠建筑提供给我们作为校舍,他们从来没有与沦陷区学生争夺升学机会,并且把最优秀的教学骨干稳定在国立中学。这是多么宽阔的胸怀,多么真挚的爱心!2006年暮春,我在57年后重访江津德感坝国立九中旧址,附近居民闻风聚集,纷纷前来看望我这个“安徽学生”(当年民间昵称),执手畅叙半个世纪以前往事情缘。我也是在川江的水、巴蜀的粮和四川、重庆老百姓大爱的哺育下长大的啊!这是我终生难忘的记忆。

当然,这八九年更为重要的记忆是抗战,抗战是这个历史时期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抗战涵盖一切,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记得在重庆大轰炸最频繁的那些岁月,连许多餐馆都不失“川味幽默”,推出一道“炸弹汤”,即榨菜鸡蛋汤。……历史是记忆组成的,个人的记忆汇聚成为群体的记忆,群体的记忆会汇聚成为民族的乃至人类的记忆。记忆不仅由文字语言承载,也保存于各种有形的与无形的、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之中。历史学者应该是文化遗产的守望者,但这绝非是历史学者单独承担的责任,而应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因此,我对《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编纂出版寄予厚望。

抗日战争是整个中华民族(包括海外侨胞与华人)反抗日本侵略的正义战争。自从19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历次反侵略战争都是政府主导的片面战争,由于反动统治者的软弱媚外,不敢也不能充分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所以每次都惨遭失败的结局。只有1937年到1945年的抗日战争,由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长期内战的国共两大政党终于经由反复协商达成第二次合作,这才能够实现史无前例的全民抗战,既有正面战场的坚守严拒,又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英勇杀敌,经过长达8年艰苦卓绝的壮烈抗争,终于赢得近代中国第一次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我完全同意《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的评价:“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了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奠定了基础。”

中国的抗战,不仅是反抗日本侵华战争,而且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在“脱亚入欧”方针的误导下,逐步走上军国主义侵略道路,而首当其冲的便是中国。经过甲午战争,日本首先占领中国的台湾省,随后又于1931年根据其既定国策,侵占中国东北三省,野心勃勃地以“满蒙”为政治军事基地妄图灭亡中国,独霸亚洲,并且与德、意法西斯共同征服世界。日本是法西斯国家中最早在亚洲发起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国家,而中国则是最早投入反法西斯战争的先驱。及至1935年日本军国主义者通过政变使日本正式成为法西斯国家,两年以后更疯狂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由于日本已经与德、意法西斯建立“柏林—罗马—东京”轴心,所以中国的全面抗战实际上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并且曾经是亚洲主战场的唯一主力军。正如1938年7月中共中央《致西班牙人民电》所说:“我们与你们都是站在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最前线上。”即使在“二战”全面爆发以后,反法西斯战争延展形成东西两大战场,中国依然是亚洲的主要战场,依然是长期有效抗击日本侵略的主力军之一,并且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2002年夏天,我在巴黎凯旋门正好碰见“二战”老兵举行盛大游行庆祝法国光复。经过接待人员介绍,他们知道我也曾在1944年志愿从军,便热情邀请我与他们合影,因为大家都曾是反法西斯的战士。我虽感光荣,但却受之

有愧,因为作为现役军人,未能决胜于疆场,日本就宣布投降了。但是法国老兵非常尊重中国,这是由于他们曾经投降并且亡国,而中国则始终坚持英勇抗战,并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赢得最后胜利。尽管都是“二战”的主要战胜国,毕竟分量与地位有所区别,我们千万不可低估自己的抗战。

重庆在抗战期间是中国的战时首都,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所在地,“二战”全面爆发以后更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因而具有多方面的重要贡献与历史地位。然而由于大家都能理解的原因,对于抗战期间重庆与大后方的历史研究长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至少是难以客观公正地反映当时完整的社会历史原貌。现在经由重庆学术界倡议,并且与全国各地学者密切合作,同时还有日本、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外国学者的关怀与支持,共同编辑出版《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堪称学术研究与图书出版的盛事壮举。我为此感到极大欣慰,并且期望有更多中外学者投入此项大型文化工程,以求无愧于当年的历史辉煌,也无愧于后世对于我们这代人的期盼。

在民族自卫战争期间,作为现役军人而未能亲赴战场,是我的终生遗憾,因此一直不好意思说曾经是抗战老兵。然而,我毕竟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亲历者、见证者,仍愿追随众多中外才俊之士,为《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的编纂略尽绵薄并乐观其成。如果说当年守土有责未能如愿,而晚年却能躬逢抗战修史大成,岂非塞翁失马,未必非福?

2010年已经是抗战胜利65周年,我仍然难忘1945年8月15日山城狂欢之夜,数十万人涌上街头,那鞭炮焰火,那欢声笑语,还有许多人心头默诵的杜老夫子那首著名的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即以此为序。

庚寅盛暑于实斋

(章开沅,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现任华中师范大学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主任)

序

周 勇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转折点。”^①

“这一伟大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洗刷了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重新确立了我国在世界上大国地位,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这一伟大胜利,也是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维护世界和平作出的重大贡献。”^②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是中国的战时首都、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地,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政治舞台,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统帅部所在地,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以重庆为中心的中国西部地区,是中国抗战的大后方,大后方人民在浴血奋战的抗战历史中,创造出独具特色的抗战历史文化。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发展的主导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倡导和推动建立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2008年以来,在中共重庆市委的领导下,重庆市实施了“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和建设工程”。在此背景下,我们根据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历史特点,专门设计以抗战时期国共合作为题的重大研究项目,获得了中宣部的批准立项。历时八年,我们承担并开展了国家交给我们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及其经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新进展、新成果。纳入《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

^①胡锦涛:《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5年9月3日),《人民日报》2005年9月4日。

^②《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7月30日),《人民日报》2015年7月31日。

化丛书》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及其经验研究系列”就是这些成果的集中体现。

时值上述成果完成并即将出版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于2015年7月30日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回顾和思考,进行了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时强调:长期以来,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同时,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相比,同这场战争对中华民族和世界的影响相比,我们的抗战研究还远远不够,要继续进行深入系统地研究。”“要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为此他要求“要加强国家层面的统筹协调,按照‘总体研究要深、专题研究要细’的原则,制订中长期规划和具体工作方案,确定研究重点和主攻方向。”^①

这一重要讲话是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的顶层设计,意味着抗战研究将作为中国近现代历史学科的“显学”而成为常态,进入重点推进的新阶段。

在本课题结题的时候,这一讲话既是对既往研究的充分肯定,更是对未来深入研究的方向引领。

一、项目体系

大家看到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及其经验研究系列”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第二次国共合作及其经验研究——以中共中央南方局和抗战大后方为中心”(项目批准号:09@ZH012,简称“特别委托项目”)的最终成果。

这一项目的申报始于2008年重庆市酝酿“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和建设工程”之际,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宣传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军事科学院等单位的大力支持。这一项目由重庆市委宣传部和西南大学联合申报,以周勇教授为首席专家,由中共重庆市委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工作协调小组及其办公室牵头,整合国内及全市研究力量,协同实施。

^①《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7月30日),《人民日报》2015年7月31日。

在此背景下,这一课题所涉及的一批重要的研究及工作项目被列为“特别委托项目”的子课题,有的被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列为重庆市社科规划的重大项目,形成了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核心主题,以“特别委托项目”为中心,以重庆社科项目为延伸,以全国范围研究力量为骨干,强调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历史研究与史料搜集相结合、学术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主次分明、层次清晰的立体式项目结构,以达成研究力量多元、优势互补的研究体系。从而很好地发挥了中央和地方的学术引擎“双驱动”作用,呈现相互支撑、协同创新、成果互补的良好局面,为完成这一国家社科规划重大项目打下了坚实基础。

这些项目主要有:

2009年:“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与发展研究”(中央党史研究室李蓉主持,批准号:2009-ZDZX02)、“第二次国共合作国际国内环境研究”(西南大学张国镛主持,批准号:2009-ZDZX01)、“第二次国共合作政策与策略研究”(重庆市委党校胡大牛主持,批准号:2009-ZDZX03)、“第二次国共合作模式与机制研究”(西南大学潘洵、鲁克亮主持,批准号:2009-ZDZX04)、“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分歧、冲突与谈判研究”(西南大学张守广、谭刚主持,批准号:2009-ZDZX05)、“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成效与影响研究”(西南大学刘志英、杨如安主持,批准号:2009-ZDZX06)、“第二次国共合作破裂以来的国共关系的演变研究”(北京大学牛军主持,批准号:2009-ZDZX07)、“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经验及其对当前发展两岸关系的指导意义研究”(重庆市委宣传部苟欣文主持,批准号:2009-ZDZX08)。

2010年:“抗战大后方与周恩来研究”(中央文献研究室廖心文主持,批准号:2010-ZDZX03)、“抗战时期国共合作档案文献资料汇编”(西南大学潘洵主持,批准号:2010-ZDZX11)、“重庆谈判档案文献汇编”(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刘志平主持,批准号:2010-ZDZX12)、“国民参政会档案文献资料汇编”(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黄晓东主持,批准号:2010-ZDZX13)、“政治协商会议档案文献资料汇编”(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何林主持,批准号:2010-ZDZX14)、“中共南方局党史资料汇编”(重庆市委党史研究

室徐塞声主持,批准号:2010-ZDZX10)。

2011年:“董必武与抗战大后方研究”(西南政法大学俞荣根主持,批准号:2011-ZDZX01)、“红岩千秋——南方局口述历史资料集”(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刘志平主持,批准号:2011-ZDZX02)。

2012年:“西部12省区市抗战大后方党史系列研究”(重庆市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会周勇主持,批准号:2012-ZDZX02)。

2013年:“中共南方局与抗战大后方社会研究”(西南大学陈跃主持,批准号:2013-ZDZX02)、“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文献选编”(重庆红岩联线管理中心朱军、刘志平主持,批准号:2013-ZDZX05)、“抗战大后方八路军办事处档案文献汇编”(重庆红岩联线管理中心朱军、吴绍阶主持,批准号:2013-ZDZX06)、“中国抗战时期中间党派档案文献选编”(重庆市政协学习与文史委员会杨力主持,批准号:2013-ZDZX07)、“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活动研究”(重庆工商大学洪富忠主持,批准号:2013-ZDZX10)、“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舆论话语权研究”(重庆大学张瑾主持,批准号:2013-ZDZX28)。

2014年:“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文献研究”(西南大学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刘志平主持,批准号:2014-ZDZX06)、“抗战时期美国与中共关系档案资料汇编”(西南大学张凤英主持,批准号:2014-ZDZX19)。

二、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立项研究“第二次国共合作及其经验”,旨在深化考证研究,增进历史认同,解决遗留问题,构筑政治互信,探索合作新路。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就是中国政治舞台上影响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两大政党。虽然两大政党在政治纲领、政治信仰方面存在重大差异,但却有过两次比较成功的合作,对国家进步、民族复兴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令人遗憾的是,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国共两党发生了严重的政治对抗,乃至兵戎相见,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今。

中共中央提出:“两岸应该本着建设性态度,积极面向未来,共同努力,创造条件,通过平等协商逐步解决两岸关系中历史遗留的问题和发展过程中产

生的新问题。”^①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共中央进一步提出,要“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特别提出,要“推动海峡两岸学术界共享史料、共写史书,共同捍卫民族尊严和荣誉”^②。为此,史学工作者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尊重历史,求同存异,追求最大共识,增进政治互信,为推动两岸和平统一作出贡献。

因此,今天我们研究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

(一)有利于充分认识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核心和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充分认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大后方的卓越历史地位和巨大作用,深刻反映中国共产党倡导和推动建立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历程,继承和弘扬红岩精神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逐渐形成了两条战线、两个战场。一个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倡导和推进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特别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国际国内形势风云激荡,政治斗争纷繁复杂。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始终高举抗日和民主的旗帜,坚持国共合作,牢牢把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正确处理统一战线中的阶级关系,凝聚民族力量,推动全民抗战,既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又为民主党派阵营的形成和新中国建立后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格局的开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在党中央领导下,以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南方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培育了以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为本质的红岩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精神风范中的核心价值。红岩精神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深入研究第二次国共合作及其经验,就是要加强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大后方的地位和作用

^① 胡锦涛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08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2009年1月1日第1版。

^②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7月30日),《人民日报》2015年7月31日。

的研究,梳理中国共产党倡导和推进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生、发展历史轨迹,厘清各民主党派成长历史和经验教训,深入研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机制和方法。大力弘扬红岩精神,有利于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增强民族凝聚力,加强民族大团结,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二)有利于充分认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增强新时期发展国共关系和两岸关系的责任感和自觉性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面对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和国内日益高涨的抗日浪潮,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及时调整政策,以民族利益为重,捐弃前嫌,求同存异,毅然再次合作,共赴国难,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空前团结,并最终取得了近百年来第一次民族解放战争的完全胜利,开启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伟大转折。通过对大陆、台湾及其他地区和国家保存资料的参照对比、梳理考证和重新解读,进一步研究抗战时期国共两党艰难曲折的合作历程,还原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真实;系统论证第二次国共合作取得的重大成果及其对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对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伟大转折、对国共两党的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总结梳理抗战结束后,两党政治对立、国家分裂对民族复兴和国家利益造成的严重伤害,将有利于我们充分认识国共两党“合则对国家有利,分则必伤民族元气”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增强新时期发展国共关系和两岸关系的责任感和自觉性。

(三)有助于化解歧见,增加互信,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排除历史认知障碍

抗战时期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既是国共两党求同存异、相忍为国的集中体现,也是两党智慧较量和实力斗争的充分展示。第二次国共合作取得了抗战的胜利,推动了民族的复兴,同时也对国共两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共产党通过与国民党的合作、与广大中间党派的合作,努力争取实现抗日和民主两大目标,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建立了一系列根据地,拥有了强大军队,党员人数剧增,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成为全国性大党,为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初步得到国际社会的了解,也为新中国政治制度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中国国民党通过合作抗日,取得了中国历史上成功抵御外敌入侵、胜利还都的“不曾有的先例”(冯友兰语)。然而,长期以来,国民党和台湾方面并不认同国共合作,甚至完全不提“国共合作”,其中重要原因,就是把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完全归咎于国民党在抗战时期所谓的“容共政策”,认为在两次国共合作中,国民党都吃尽苦头,终以中华民国退出中国大陆为代价,因此决不能再搞“国共合作”。这种对国共合作历史及经验教训的认识误区,实际上已成为国民党和台湾当局的一个历史包袱,也是阻碍当前发展两党和两岸关系的制约因素。因此,深化对第二次国共合作历史的研究,以科学的历史观正确认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成果、影响及经验教训,有助于增进国共两党、海峡两岸的历史认同,逐步解决两岸关系中的历史遗留问题,构筑两岸政治互信的基石,从而排除祖国和平统一的历史认知障碍。

(四)有助于借鉴历史经验,在新的形势下积极探索发展两岸、两党关系的新内容、新形式与新机制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同世界的关系也发生了历史性变化。随着国家综合国力的整体增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正在进一步提升,两党交流合作、两岸共谋发展迎来了新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两岸关系历经风雨坎坷,随着国民党在台湾执政地位的重新确立,台湾局势发生积极变化,两岸关系也迎来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历史研究的终极目的不仅是知晓过去,更是理解现在,指引未来。抗战时期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党际合作、朝野合作,最终表现为团结御侮、民族复兴,表现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顽强生命力,尤其突出地表现了中华民族持久坚韧的民族凝聚力。研究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就是为发展两党关系和两岸关系提供历史的借鉴。这有助于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探索基于民族凝聚力、建立党际政治互信与政治合作的制度性框架,乃至更广泛层次的合作策略、合作模式与合作机制(如基于一个国家之下的不同政权、不同政党之间的合作),探索发展两党关系和两岸关系的新内容、新形式、新

模式,有助于促进结束两党、两岸的政治对立,实现祖国的早日统一。

(五)有助于深化对中国近代史、抗日战争史、中华民族复兴史、国共两党关系史、民主党派史的研究,进一步从学理和法理上遏制“台独”,促进祖国统一

正确的历史经验教训建立在科学的理论指导和最基本的史实研究基础之上。没有客观、深入和系统的研究,不可能实事求是地弄清楚长期影响着两党感情的种种历史矛盾和冲突的来龙去脉。仅仅满足于早已设定的政治结论,既不利于学术研究,也不可能正确地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深入研究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要坚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要注重现实关怀,坚持学术标准,在还原历史的真实上狠下功夫;需要在已有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立足新形势,拓宽新领域,挖掘新史料,构建新体系,提出新思考;在历史研究中再攀学术高峰,从而深化对中国近代史、抗日战争史、中华民族复兴史、国共两党关系史、中国民主党派史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抗战历史文化研究,特别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历史研究的基本前提是“一个中国”原则。因此,研究国共合作的历史就是对“一个中国”的论证,是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坚持。因此,基于科学和理性基础上的研究,就是从学理和法理方面遏制“台独”,这是海峡两岸学界对促进祖国统一最实在的贡献。

三、国内外对第二次国共合作研究现状述评

(一)国内(含台湾地区)研究现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界对国共两党关系史的研究日益深入,硕果累累。其中对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研究,成绩尤为显著。

发表的论文,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为止,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主题在CNKI学术期刊网上进行检索,有研究论文1200余篇,其主要侧重在共产国际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的历史过程和涉及的人物、对抗日战争胜利所起的巨大作用和意义、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国共两党的历次谈判、第二次国共合作为什么没能实行党内合作、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是否取得合法地位、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两党关系发生根本变化的标志、第二次国